



以中国人的视角看世界
以老百姓的视角看中国

读懂世界的 第一本经济学书



梁小民◎著

THE FIRST ECONOMICS BOOK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每个人都需要懂一点儿经济学。别听专家讲道理，
听“一介小民”说点儿闲话，经济学也可以很好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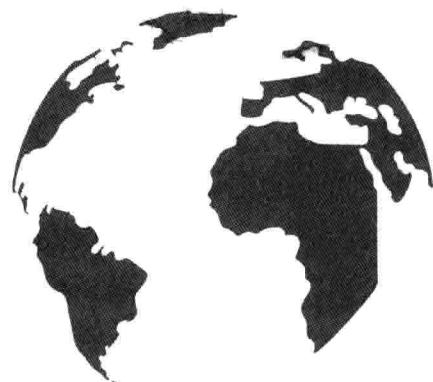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读懂世界的 第一本经济学书

THE FIRST ECONOMICS BOOK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梁小民◎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懂世界的第一本经济学书/梁小民著.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3

ISBN 978-7-5502-2573-2

I. ①读… II. ①梁… III. ①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①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3436号

读懂世界的第一本经济学书

出版统筹：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王 巍

封面设计：王 鑫

版式设计：李 萌

责任校对：宋亚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13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5印张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2573-2

定价：36.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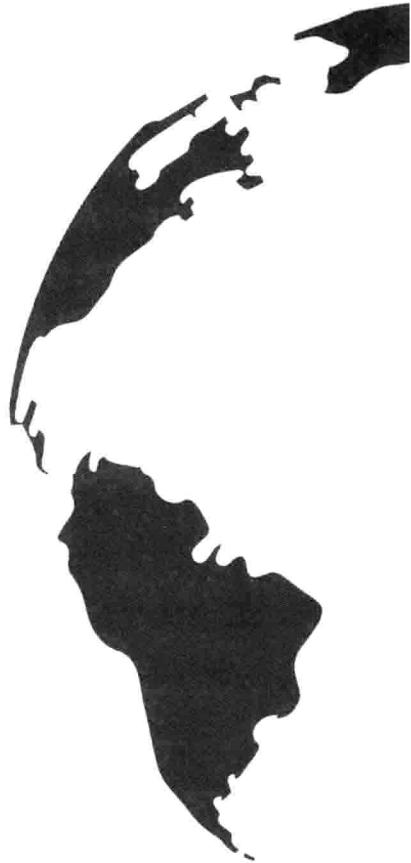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8876681 010-88876682

目 录 Contents

经济向钱看	_1
GDP 不是万能的	_4
未来不是预测出来的	_7
别把模型当个宝	_10
死亡和税收确定无疑	_13
大危机的货币因素	_16
利率是影响经济的纽带	_19
利率成了牛鼻子	_22
汇率让你喝到免费啤酒	_25
蒙代尔作秀的资本	_28
格林斯潘的皮包	_31
另类的货币政策	_34
央行需要独立	_37
费尔普斯获奖了	_40
内需不足，企业有责	_43
市场化扶贫	_46
创新从制度开始	_49
走在政策变动之前	_53
皮洛斯的胜利	_56

- 克鲁格曼的预言 _62
卢卡斯的辉煌与尴尬 _65
经济走在钢丝上 _68
莫让病人吃错药 _71
海水之中有湖水 _74
经济不玩过山车 _77
背着抱着一样沉 _80
餐桌上的曲线 _83
宏观调控不是筐 _86
公债哲学的是是非非 _89
赤字财政不是万能药 _92
预期不是占卜 _95
GDP 与全球一体化 _98
模型比推理更管用 _101
从投入增长到技术进步 _104
世界末日不是危言耸听 _107
官商结合新解 _110
共同富裕不靠劫富济贫 _112
渐进式改革不是让步、妥协 _115
技术进步，制度在先 _118
站在利益集团之上 _121





血汗工厂，责在政府	_124
企业不是惯出来的	_127
善人种出恶果	_130
资本创造历史	_133
中国的世界工厂之路	_136
穷国穷在制度上	_139
减税减得有学问	_142
货币量与通货紧缩	_145
战争时期的货币武器	_148
经济转型中的通货膨胀	_151
反通货膨胀的功与过	_154
大萧条的经验与教训	_157
减税如何刺激经济	_160
不要踩在美联储的头上	_163
格林斯潘的经济魔术	_166
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代	_169
政策运用的经济前提	_172
调节经济的艺术	_175
拿起经济学之剑	_178
假设、理论与现实	_180

- 法国包税制的教训 _183
- 圈地运动的历史功绩 _186
- 市场营销与市场结构 _189
- 欧佩克不再风光 _192
- 哈韦路假设的破产 _195
- 工业化道路上的体制混乱 _198
- 重税之下无发展 _202
- 迎接东南亚经济一体化 _205
- 让 GDP 变轻 _207
- 政府该管什么价格 _209
- 引导公众进行正确预期 _211
- 学会应对随机冲击 _213
- 经济学也讲道德 _215
- 经济学不能陷入道德误区 _218
- 把经济学拉下神坛 _221
- 经济学家不能治国 _224

经济向钱看

市场经济改革之初，有学者提出，市场经济就是“向钱看”的经济，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应该承认，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对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宣扬“重义轻利”，似乎只有为什么主义或理念奋斗才崇高，一谈到钱或利就俗不可耐了。所以，尽管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交换到各种享受，人人内心里都爱之甚深，但却要装出一副“疾钱如仇”的样子。文雅点的把钱称为“阿堵物”，直白点的把钱称为“铜臭”。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两回事，这就是传统文化道德的伪。计划经济下，我们也是重精神、轻物质。钱似乎成了万恶之源，谁要强调一下与钱相关的物质激励，就被指责为金钱挂帅、修正主义。

对钱的这种错误认识使社会不能建立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资源配置失误，生产效率低下。人人都不敢说钱，人人都没有钱。说起来是社会平等，实际上是共同贫穷。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从讲“钱”、调整经济利益关系（就是钱的关系）开始的。商鞅变法、贾探春掌管荣国府、赫鲁晓夫在20世纪60年代的试探性改革，以及中国最早的包产到户，莫不如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把利润（金钱）作为企业提高效率的“牛鼻子”。对金钱的态度往往成为保守与改革的分水岭。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位学者在改革之初强调人们敢于“向钱看”，是进步的、有意义的。把市场化经济

改革简化为“向钱看”固然片面了一点，但当年这种矫枉过正的说法还是有震撼意义的。矫枉必过正，正是这样吧。

但是，矫枉过正的极端说法毕竟不是科学的观点。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可以从一个极端的口号开始，但如果不能归到科学的态度，则会随风而过，甚至产生破坏作用。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来以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向钱看”这个口号。

市场经济当然要讲“钱”。对社会来说，“钱”或者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经济状况的最重要指标。对企业来说，“钱”或者利润是经营好坏的最重要指标。对个人来说，“钱”或者收入是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指标。“钱”作为可衡量的物质利益或财富，能推动社会进步。“钱”并不低俗，也没有什么罪过。

然而，“钱”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一切。从本质上说，自由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概括了市场经济的实质。市场经济要使整个社会福利不断提高，或者说使每个人的物质与精神享受增加。“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或基础，但并不是这个目标本身。把“钱”作为市场经济的中心和全部，往往会引起不合意的结果。一个社会把GDP作为唯一目标会引起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平加剧等问题。结果GDP增加了，“钱”多了，人民未见其幸福。一个企业不惜一切手段追求利润，甚至突破了法律和道德底线，在某一时期内会得到大量“钱”，但绝不可能基业常青。一个人只知道赚钱，“钱”再多也谈不上“幸福”二字。完全用“钱”去引导一切，这个市场经济就会脱离它的终极目标、脱离正常发展的轨道。其结果必然是一场社会灾难。“向钱看”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推动社会前进，也可以摧毁一个社会。

市场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向钱看”的经济。市场经济讲“钱”有三个重要前提。一是立法。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用法律来维护社会秩序。赚钱是正当行为，但如果用违法手段去赚钱，如走私、贩毒、侵权、造假，就不是我们提倡的正常的“向钱看”。二是道德。市场经济不仅讲

“钱”，还讲一切美好的东西，如对社会的责任、对其他人的同情、没有金钱利益的见义勇为、人与人之间纯洁的友情，等等。为金钱而抛弃一切，为金钱而突破道德底线，绝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市场经济。三是公平竞争。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把“钱”（利润或收入）作为一种引导，才会有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因为竞争是效率的来源。如果存在垄断，垄断者“向钱看”，看到的只有它自己的“钱”，而无助于效率提高。不讲这些前提，简单地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向钱看”，其不利于社会进步的那一面刃就要危害社会。

中国是一个“口号化”的国家。“口号化”的特点就是把那些本身并不错的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从而引起很坏的结果。强调市场经济要“向钱看”并不算错，但成为一个简单的口号，忽略了它本身许多至关重要的内涵时，就产生了许多倡导者意想不到的结果。社会“向钱看”，就有唯GDP论；企业“向钱看”，就有伪劣产品；个人“向钱看”，就有种种诈骗事件；甚至医生、教师也“向钱看”，就有收红包、乱收费了。“向钱看”到了这个地步，就糟蹋市场化的名声了。

“口号”害人，“口号”误国，现在是该清理一下包括“向钱看”在内的“口号”的时候了。

GDP 不是万能的

有一阵子，人们对 GDP 爱得要命，唯 GDP 论英雄，为追求 GDP 增长而舍弃一切。这阵 GDP 热过去之后，人们发现，在 GDP 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了、环境污染加剧了，于是又开始恨起 GDP 来，倡导不具操作性的绿色 GDP，甚至要取消 GDP。这 GDP 到底怎么了，让人爱来，又让人恨？

其实 GDP 仅仅是衡量一国整体经济状况的一个数字指标，爱与恨都大可不必。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和企业都要根据整体经济状况做自己的决策，政府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势态制定政策。这就需要一个具体的指标来反映整体经济运行状况。而且，这种指标必须具体、明确，让人一看就懂。于是经济学家建立了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创造了 GDP 这个指标。自从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建立这个体系以来，GDP 这个指标一直在使用和改进中。应该说，GDP 是能基本反映一国整体经济运行状况与历史趋势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为公众接受的另一种指标体系来替代 GDP，也没有一个国家不使用 GDP 这个指标，或有放弃 GDP 统计的计划。人人都用这个指标，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

经济发展的基本目的是提高所有人的福利。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或者从世界各国来看，GDP 增长与人民福利的增长是同方向变动的。GDP 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这代表一国的经济实力和财富，是人民福利增加的基础。没有 GDP 的增长，绝不可能有福利增加。追求 GDP 是各国政府的

共同目标，何罪之有？

当然，还应该强调的是，GDP 并不是衡量一国经济和人民福利的完善指标。首先，GDP 的统计并不是准确的，难免有重复计算或遗漏。GDP 是计算物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不进入市场交易的物品与劳务就无法计算进去。例如，毒品、娼妓等非法交易；虽然合法但为逃税而产生的地下经济及相应的灰色收入；自我服务的家务劳动或自给自足的物品生产，等等。法治越不完善，市场化程度越低，GDP 遗漏的就越多。据经济学家统计，就全世界而言，这一部分占 GDP 的 2% ~ 7%。而且，经济越不发达，这一部分越大。

其次，GDP 没有反映出为增加 GDP 而付出的代价。例如，在 GDP 增长的同时环境恶化了，自然生态破坏严重，资源枯竭。这种代价无法算入 GDP 中，但对人民福利有负面影响。再如，当把更多资源用于军备时，GDP 也会增加，但 GDP 反映不出用于提高人民福利的物品与劳务的减少。正基于这个原因，经济学家早就区分了反映生产水平的 GDP 和反映人民福利的净经济福利（NEW）指标。

最后，GDP 是总量指标，不能反映收入分配状况。在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随着 GDP 增长，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这时，GDP 增加反而会引起人民福利的下降。GDP 也好，人均 GDP 也好，都无法反映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出现“富裕中的贫困”这种不正常现象。

由于这些原因，各国都不把 GDP 作为衡量一国经济状况的唯一指标。在衡量经济与福利状况时还有物价指数、失业率、贸易总量、人均收入、环境污染指数、基尼系数等指标。同时，由于各国市场化程度不同、汇率不同，也很难仅仅用 GDP 来比较各国的经济与福利水平。

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 GDP 这个指标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也在努力地完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和 GDP 指标。但仍然是理论上的分析多，实际的可操作性小。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提出了净经济福利这个指标，但至今仍没有一套可以操作的计算方法，至今未被各国和联合国

统计当局采用。至于绿色 GDP 云云与净经济福利指标也并没有什么根本差别。在没有更好的、可替代 GDP 的指标出现之前，我们还不得不用 GDP。无论你爱 GDP 也好，恨 GDP 也好，使用 GDP 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对我们国家来说，不是要不要用 GDP 指标的问题，更不是用绿色 GDP 来代替 GDP，而是要完善 GDP 统计工作。从以往经济普查之后中国 GDP 数字较大幅度的调整来看，GDP 的统计工作还有缺陷。总体上是低估了，但不同省份有的遗漏较多，有的还有“注水”。这就要严肃统计工作立法，更全面、准确地收集统计资料，并运用更先进的统计技术手段，使 GDP 更真实、更准确。GDP 越接近于真实，经济政策的失误就越少。

这些年来，中国 GDP 的增长率相当高，但由于底子薄、人口多，GDP 总量和人均 GDP 都不高。因此，追求 GDP 增长、保持较高的 GDP 增长率，仍然是重要的。GDP 不是万能的，但没有 GDP 却是万万不能的。和谐社会的建立，GDP 增长还是基础。我们要纠正的是唯 GDP 的那个“唯”字。这就是说，我们在追求 GDP 的同时，要注意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并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如果把唯 GDP 作为“右”，把放弃 GDP 指标作为“左”，在 GDP 问题上就要既反“左”又防“右”，走一条中间路线。

未来不是预测出来的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集中分析了短期宏观经济。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分析长期问题时，他回答了一句：长期中我们都要死。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时间越长，这种不确定性越多，无法预测的突发随机事件也越多。因此，在经济学家所做的许多长期预测中，正确者极少。

“二战”之前，汉森等一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长期停滞论”。他们预言，战争结束后军备开支急剧减少，总需求会严重不足。因此，在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时，经济会出现一个相当时期的低迷，甚至停滞。从理论上看，这种预测没有问题。但结果，这种长期停滞并没有出现，战后整体经济是繁荣的，即使在战争刚结束的一段时间，经济也没有出现他们预言的严重衰退。这是因为他们当时没有预料到战后的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国家干预经济，用政府公共工程支出来代替军备支出，总需求不仅没有减少，还有所增加。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当权时实行的高速公路计划就强劲地拉动了经济。二是“二战”结束并不是战争消亡，军备支出减少。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冷战引起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

长期停滞论者当时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以后世界的这些变化，预测当然落空了。

长期停滞论是根据经济理论从逻辑上推导出来的，依据并不充分。如果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大量翔实的数据，预测的结果会如何呢？

20世纪60年代后期，面对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严重，不少人对人类未来的前途忧心忡忡。1968年，意大利菲亚特董事长邀请西方国家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等各界学者讨论人类的未来，这就是著名的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委托计算机专家麦多斯对人类未来进行预测。这种预测结论就是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麦多斯把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作为制约人类未来增长的五大因素，建立了一个反映这些因素与增长之间关系的反馈环路以及相关模型，并代入各种实际数据进行运算。结论是如果照现在的方式增长下去，人类将在2100年之前崩溃。唯一的出路是在1975年停止人口增长，1980年停止工业资本增长。但从这些年来，人类并没有停止人口与工业资本增长，也没有人类崩溃的预兆。这种对人类未来的悲观预测被称为“带计算机的马尔萨斯”。如今人们都很少谈起这种预测了，因为模型没有考虑到以后发生的许多事件，尤其是各国政策变化与技术进步。

让我想起这些失败的长期预期的是一份《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这份报告预期，到2050年，中国人的最低工资按2002年价格要达到1300美元，信息化率达80%，出国旅游率达50%，汽车普及率达50%，等等。看了这份报告，未来真的很好，但网民的评论是“画明天的饼，充今天的饥”。

写这份报告的研究小组似乎就是以“画明天的饼”为己任。他们的同类报告甚至预言了哪一个城市将在哪一年进入现代化。学者对此的反应也是批评者居多。

这些专家学者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运用先进技术所做出的预测为什么被人们嘲笑？他们预测的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但这几十年间的变数太多了。退回过去，谁敢想象中国会走市场经济之路？谁能想到“非典”的流行？想想过去发生了多少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而这些事件对经济的未来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谁又能想象出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事件，这些事件对中

国未来的走势又会有什么影响？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在出人意料地变化。任何一个模型，即使包含了随机变量，也难以对较遥远的未来做出接近实际的预测。

这个报告是根据现有的数据资料预测未来的。这世界是一个变动的世界。我们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不可预期的因素更多。用现在已知的情况去预测未来，颇有点刻舟求剑的传统。这样的结论如何让人相信呢？根据《报告》提供的预测数字，在 2050 年我们可以达到现在美国的水平；有些指标，如绝对贫困为零，养老、医疗保险覆盖率达百分之百等，还超过了美国。但千万别忘了，现在我们比美国落后 100 年，用 40 多年就赶上，甚至超过现在的美国，是不是又有点想跃进了？

绝大多数人并不相信 2050 年最低月收入可到 1300 美元，这种预测也并不能鼓励我们的斗志。如果这种研究是个人进行的，他用自己的钱也就罢了。但这个项目是国家资助的，参与者都是领国家的工资、花纳税人的钱。把并不多的研究经费用于这种遥远的未来，不如去研究近一二年中的现实问题，如资源和环境制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等等。

中国美好的未来不是预测出来的，是干出来的。画一张明天的饼，不如踏踏实实地做好今天的饼。

别把模型当个宝

偶尔翻一本杂志，看到国内一家颇负盛名的学术机构和香港合作对2005年下半年中国经济走势的预测。据他们的预测，2005年下半年GDP增长将以7月份为拐点，呈现下滑态势。全年平均增速8.6%，消费物价指数持续下降，第三、第四季度为负数。

2005年已经过去了，结果与预测相差甚大，全年的增长率为9.9%，经调整后又为10.2%。整个经济在持续上升，根本没有拐点和下滑的迹象。消费物价指数并不高，但并没有出现负的情况。两家权威的学术机构、一批学富五车的海归学者，为什么对半年内的经济走势做出了如此错误的预测呢？

据报道，这个预测依据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由于它据称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得到了国内相当一批学者的支持和认可。所谓“科学的基础”就是用经济计量模型“依靠机器算出来的冷冰冰的数据”。如此科学的工具居然得不出科学的结论，我们不得不问，这种工具到底有多少科学的成分？

经济学家经常用数学工具来研究经济问题。其中运用最广的就是编制经济计量模型来预测未来经济走势，或者检验经济政策的效果。应该说，这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首创经济计量模型的两位经济学家弗瑞希和丁伯根获得了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获奖的经济学家至少一半以上与